

北京专史集成

主编 王岗

北京商业史

本书主编 齐大芝



人民出版社

北 京 专 史 集 成

主 编 王 岗

北京商业史

本书主编 齐大芝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商业史 / 齐大芝主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北京专史集成》/ 王岗 主编)

ISBN 978-7-01-009952-1/

I. ①北… II. ①王… ②齐… ③张… III. ①商业史-北京市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3393 号

北京商业史

BEIJING SHANGYESHI

主 编: 齐大芝

出版策划: 张秀平

责任编辑: 张秀平

装帧设计: 曹 春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厂: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5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9952-1/

定 价: 7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组成员

总顾问：刘牧雨

总策划：戚本超

主 编：王 岗

特聘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钟翰、陈高华、
林甘泉、赵其昌、徐苹芳、曹子西、龚书铎、蔡美彪、
戴 逸

名誉顾问：陈之昌

执行策划：王 岗、李宝臣、刘仲华、章永俊

编委会主任：李宝臣

编 委：王 玲、尹钧科、阎崇年、王灿炽、吴建雍、
于德源、李宝臣、孙冬虎、袁 熹、王 岗、吴文涛、
郑永华

分卷主编：（见各卷）

课题组成员：王 岗、尹钧科、吴建雍、于德源、李宝臣、
袁 熹、邓亦兵、孙冬虎、吴文涛、何 力、郑永华、
刘仲华、张雅晶、赵雅丽、章永俊、何岩巍、许 辉、
张艳丽、董 焱、王建伟

课题组特邀成员：张 泉、齐大芝、赵志强、徐丹佷、
李建平、韩 朴、谭烈飞、马建农、姚 安、邓瑞全、
郝志群、宋卫忠等

本书主编：齐大芝

本书撰稿人员：齐大芝 张建明

序

北京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从事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30年来，在全所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一些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其中，又以曹子西先生主编的《北京通史》为代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而《北京通史》的问世，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北京历史文化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2006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加大扶持力度，提出把《北京专史集成》列入院科研重大课题，使得我院的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历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始对北京专史进行研究，如王玲女士撰写有《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尹钧科先生撰写有《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于德源先生撰写有《北京农业经济史》，吴建雍等人合写有《北京城市生活史》、《北京城市发展史》，等等，这些专史的问世把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但是，要想形成一套体系完备的专史研究系列，显然仅仅依靠个人的研究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组成一支力量相对强大的科研队伍，才能够完成系列专史研究的繁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历史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对《北京专史集成》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论证。特别是课题总顾问刘牧雨院长和课题总策划戚本超副院长对课题中研究项目的编写原则和立项次序都给予了精心指导。经过论证，初步确定了《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的第一批研究项目，即：

- | | |
|--------------|--------------|
| 1. 北京政治史； | 2. 北京经济史； |
| 3. 北京农业史； | 4. 北京手工业史； |
| 5. 北京商业史； | 6. 北京军事史； |
| 7. 北京文化史； | 8. 北京文学史； |
| 9. 北京美术史； | 10. 北京学术史； |
| 11. 北京著述史； | 12. 北京戏剧史； |
| 13. 北京风俗史； | 14. 北京考古史； |
| 15. 北京民族史； | 16. 北京宗教史； |
| 17. 北京佛教史； | 18. 北京道教史； |
| 19. 北京伊斯兰教史； | 20. 北京基督教史； |
| 21. 北京教育史； | 22. 北京城市发展史； |
| 23. 北京建筑史 | 24. 北京园林史； |
| 25. 北京陵寝史； | 26. 北京地理学史； |
| 27. 北京交通史； | 28. 北京城市生活史； |
| 29. 北京建置沿革史； | 30. 北京对外交流史； |
| 31. 北京水利史； | 32. 北京饮食史； |
| 33. 北京服饰史； | 34. 北京环境变迁史； |
| 35. 北京音乐史； | 36. 北京名胜史。 |

这些研究项目，只是北京专史庞大体系中的一小部分，今后随着科研工作的不断深入，专史的项目也会不断增加。《北京专史集成》经过历史研究所论证之后，院领导又组织全院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重大课题进一步加以论证，并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专史的撰写工作有很大帮助。

《北京专史集成》中的每部专史的容量，视其内容的多少，大致在30万字左右，有些内容较多的，字数可以多一些，反之，则会少一些。各部专史的时间跨度，一般始于远古，迄于新中国建立。有些部专史在撰写过程中，时间会有所下延。如《北京建置沿革史》，必须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能够对今天北京政区的沿革状况有全面的叙述。各部专史的地域范围，也不是严格局限在今天的北京政区，而是根据不同朝代政区划分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如汉唐时期的幽州，辽代的南京析津府，金代的中都大兴府，元代的大都路，明清时期的北京顺天府，等等。政区范围的大小虽然会不断变化，但是其核心地区仍然是今天的北京。

《北京专史集成》的撰写，有很多难以处理的地方。例如，“专”和“史”的关系。“专”是指专门、专业，如在《北京宗教

史》中，“专”是指宗教或是宗教学，而“史”则是指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发生或是出现过的、与宗教有关系的事件或人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典制。如在《北京宗教史》中，我们所研究的佛教史，主要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在北京地区的禅宗、律宗、净土宗等佛教流派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这些佛教流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历代统治者和社会各界对这些宗教派别的态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要宗教事件，等等。我们认为，要想处理好“专”与“史”的关系，一方面，要掌握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当时的历史状况有准确的认识，掌握宗教之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认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产生、发展和兴衰的变化历程。其他专史的撰写工作也是如此。

再如，“全国”和“地方”的关系，换言之，即“全局”和“区域”的关系。在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所有的北京史都是“地方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区域”性质。但是，当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在北京发生的许多史事除了具有“地方”和“区域”的性质之外，又具有了“全国”或是“全局”影响的特质。如“戊戌变法”、“五四运动”等，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持久，显然不是局限在北京地区的。此外，由于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有些发生在其他区域（甚至国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会对北京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这些重大事件的始发地虽都不在北京，但其对北京的巨大影响甚至超过了在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因此，如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确实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

《北京专史集成》课题立项后，得到了学术界和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首先，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史学前辈在年事很高、工作繁忙的情况下，热情支持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慨然担任特聘学术顾问，并且对北京专史的撰写工作提出了珍贵的指导意见；有些史学前辈还在百忙之中审阅了部分书稿的内容。其次，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陈之昌主任和李建平副主任对本课题的重视，使《北京专史集成》得以被列为市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再次，本课题的出版工作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出版经费较少的情况下，得以立项出版。特别是资深历史学编审张秀平女士和诸多编辑人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

意见，为各部专史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批批老专家学者们为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他们的退休对北京文史研究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许多已经退休的老专家仍然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笔耕不辍。《北京专史集成》中的一些项目就是以他们作为骨干带领年轻同志完成的。一批批青年学子陆续来到所里，他们在科研能力上尚需锻炼，在学术见识上亟待积累，但是，他们有朝气，有吃苦耐劳的干劲，有新的更加开阔的视野，假以时日，他们在《北京专史集成》研究中的成果将会越来越多。我相信，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帮助下，在历史研究所全体新、老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持之以恒，《北京专史集成》将会为北京历史文化研究不断增添新的科研成果，为首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不断做出新贡献。

值此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建院 30 周年、《北京专史集成》开始出版之际，是为之序。

王岗

2008 年 10 月

前言

商业在中国古代先民们的生活中很早就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甲骨文中即看到了用原始货币——贝做交易的记载。而在先秦时期的最初社会分工中，商人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所谓的士、农、工、商，被统称之为“四民”。士和农是当时农耕社会的主体成员，工和商也已经有了明确的职业分工。显然，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工匠和商人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商人的身影。

秦汉以还，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辽阔疆域的稳固统治，为商人们的活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场所，使得许多商人很快就积聚了大量财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敏锐地感觉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见《史记·货殖列传》）。他给大商人们起了一个很形象的称谓“素封”，表示他们虽然没有诸侯的政治地位，却可以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从先秦时期的吕不韦，到汉代初年的蜀卓氏、程郑等人，经历了一个“拟于人君”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个黄金时代实在是太短暂了，随着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管理财政，利用税收来掠夺商人的财富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而此后的历代政府也都把抑制商人的政治发展作为重要的国策，与重视农业生产相提并论，史称“重农抑商”。而对于这项政策的评价，曾经在有一个时期引起过史学界的激烈争论，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项政策在中国古代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阻滞作用。

商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到底会起怎样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其评价也是不同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的主体成员是

地主与自耕农，他们被封建政府称之为“编户齐民”。而许多商人的掠夺对象就是众多的自耕农，他们主要通过“囤积居奇”的办法，从自耕农手中兼并土地，成为大地主，而自耕农因失去土地而大量破产，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封建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必然会限制商人经济势力的极度扩张，这在中国古代社会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

同样，中国古代的商人们在财富的增值手段上并没有复杂的程序，除了通过长途贩运，互通有无的正常贸易以获取钱财之外，借放高利贷则是最有效的方法。一旦个体小农在生产和生活的循环过程中出现经济困难，就很容易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因此，商人在封建社会中所起到的乃是“蛀虫”的作用，是把封建统治赖以巩固的基础——个体小农——一点一点地蚕食掉。“蛀虫”的活动越频繁，封建统治基础的损毁也就越快。

此外，商人获取财富主要依靠的是经济手段，而其在经济上有了雄厚积蓄之后，就会在政治上寻求特权。中国古代的封建政府对此是有高度警惕的，故而历朝政府皆特别对商人们的政治追求加以严厉限制。显然，如果有了很多钱财的人又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将会对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造成封建统治的失控。因此，在政治上对商人加以压迫，从政府的统治角度而言也是有其现实合理性的。

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是在以农耕生产为主体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有其共同的地方，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货币形式的演进，从自然形态的贝币，到贵重金属的铜币及金银，再到纸币及银票，等等，与商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是相互适应的。例如，元代交钞的印行，不仅是对世界商业史的一大贡献，而且表明当时中国的商业发展水准位于世界的前列。元朝统治者对商业的控制，较其他各朝代更为宽松，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北京地区的商业发展，到了唐代开始初具规模，这是与漕运及海运的开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的发展，特别是水路运输的发展，在古代社会中对促进北方城市商业的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估量都是不过分的。而大规模的漕运与海运，也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够完成。漕运及海运的开通最初只是中央政府出于军事需求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却留下了巨大而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这是开凿大运河的隋朝统治者和开通海运的唐朝统治者始料未及的事情。

到了辽代，燕京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贸易规模十分可观。因为辽、宋之间的相互贸易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两

宋之际，宋朝大臣许亢宗出使金朝，曾经对这里的商业贸易概况加以描述：“州宅用契丹旧内，壮丽夔绝。地北有互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文中“地北有互市”一句，在《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中皆作“城北有市”，还有的版本作“城北有三市”，笔者认为，当以“城北有互市”为准，“互市”者，不是普通的商市，也不是三座市场，而是辽、宋之间进行境外贸易的“榷场”。虽然许亢宗出使这一年辽朝已经灭亡，但是，燕京城的许多规制（包括商业设施）却还维持着辽代的旧貌。

到了金代，海陵王扩建中都城后，这里已经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商业中心。但是，第一，由于受到北方经济的局限性，与南宋的商业发展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第二，由于受到汉唐坊里制的影响，金中都城还处于坊墙封闭的状态，阻碍了城市商业的发展。然而与辽代相比，金中都商业的发展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从金朝政府开始使用交钞（即纸币）即可得到证明。

到了元代，北京（即大都城）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变成了全国、乃至东方的商业贸易中心。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人们撰写的若干《大都赋》中可以看出。特别是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京城繁华商业的描述，曾经震惊了整个欧洲。而他的描述却很少有夸张的成份，表明中华民族的都市贸易在当时显然居于世界各大都会的前列。元代都市商业的繁荣，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但是，新建的大都城打破了坊墙的阻碍，是城市商业迅速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明代和清代的北京，一直传承着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就同时维系着商业都市中心的地位。与元大都相比，明清北京的都市商业更加繁华，商品的种类更多，商市的规模更大，但是，商业活动的性质却没有发生更多的变化。商业活动的服务主体依然是帝王将相等上层社会人士，商品也是以奢华、时尚为主流特征。这种奢华的消费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使用，是很少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明清以来的北京城里，陆续设立的各地会馆，是封建都市商业发展到鼎盛阶段的突出表现。一方面，全国各地的商贾们与京城的联系通过会馆得到空前的增强；另一方面，经营不同商品的商人们之间的分工通过会馆而显现出地域特色。如徽商、晋商等，不仅仅是商人群体的地域界限通过会馆可以令人一目了然，就是这些商人群体经营的商品和活动的区域也有了明显的不同。

明清北京商业发展的封建特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豪商富贾的商业活动都是围绕着皇室和封建政府展开的。在中国古代，帝王和他们身边的皇亲国戚们在生活消费方面是很少计算成本的，因此，运用商业手段为他们提供生活奢侈品的商贾们抓住了快速致富的捷径，许多奢侈消费品的最初成本和最终价格之间的利润要远远超过普通商品的买卖收益。

当然，围绕皇室及封建政府展开商业活动，商业利润固然极为可观，但是风险也很大。因为许多商业交易活动并不是在双方地位完全平等的状态下进行的，而是在皇室及封建政府手中握有支配一切的政治特权，有时皇室爪牙和政府官员会利用这种特权从商人们的手中掠夺商品，而并不付给货款，或是只给一点象征性的钱币，史书称之为“和雇和买”。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张，在许多情况下，就连不可一世的清朝统治者也要在西方强权面前卑躬屈膝，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围绕着西方列强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们，他们在当时社会上的名声虽然很臭，但在经济上所获得的利润却是十分可观。这些“洋买办”们在把西方商品向中国倾销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信息，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商业经营理念。

“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的灭亡，围绕着皇亲国戚们牟取暴利的北京商人们也作鸟兽散，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商机。国民革命的胜利和都城迁往南京，给北京城的商业活动又带来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日寇的侵华战争及其对北平的野蛮殖民统治，更是给曾经繁荣的北京商业以致命的打击。北京在这个历史阶段离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越来越远了。

《孟子》曾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深刻概括出一种政治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商业史上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商业家族从它的崛起到衰落，往往是在百年（即所谓的“五世”）之间为一个周期。历史发展到今天，商界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手段更加复杂，竞争者也已经从个人、家族为单元扩展到了集团、国家之间的拼搏，虽然“今非昔比”，然而，历史经验仍然是有益的，我们希望通过这部《北京商业史》给读者留下更多有益的经验，不仅仅是商业竞争的经验，更是人生奋斗的经验。

王岗

记于2011年元月

概 述

北京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城，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曾经演绎过无数悲壮伟烈的历史大剧，发生过许多奔放激越的人间情事。在它身上显现的那份浓郁而强烈的文化特质，吸引了古往今来各类人群的目光，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品味着这个伟大的城市。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之一，北京城自有其骄傲之处。根据考古发现，远在7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北京猿人”在周口店等地繁衍生息。这里已有三千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和悠久的城建沿革。在最近的8个多世纪中，她则一直是中国统一的政治中心。直到19世纪，在中国以至于世界，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并不多见，而北京在元代中期，就已经是人口百万的大都市。放眼天下，这样规模的城市不仅独步海内，也雄踞世界城市之巅。同时，其雄伟规整且气度非凡的城市格局，则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得臻于极致。几百年来，它始终是世人向往之地。

北京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自然条件，是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一个好地方。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是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及蒙古的交通要道。古时，北京地区被称为“北京小平原”，这块土地是由西北方流向东南方的一条大河（一般称为“三海大河”，即今永定河）的河水冲积而成的。小平原的西面、北面和东北面环山，仅南面是平地，向南通向大平原。三面山麓前平地上河流交错，湖泊棋布，林木蓊郁，气候温润，阳光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原始人类选择定居生活的理想之处。

上古时代的北京地区就有了许多大小不同的居民聚居地，那些

不同的族相邻而居。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处，一处位于今房山区的良乡琉璃河，另一处位于今宣武区的西半部、广安门内外大街。当时这里充足的水源和平坦的土地，为古人的农耕渔猎提供了很好的生存条件；几面环绕的河流，则成为保护此地居住者的天然屏障。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这两个地方具备了建立城堡的条件。北京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北京城的历史沿革年代漫长而又曲折复杂。夏商时期，古燕国、孤竹国、山戎等均分布在这一地区。根据史料推断，上古时北京地区出现的上述两个居民聚居点，在夏、商期间都建立了作为区域统治中心的城堡。这两地所建的城堡，就是后世史家所称的商代“燕”、“蓟”的“封国”都邑。在周初的大分封中，“封召公奭于燕”和“封帝尧之后于蓟”，⁽¹⁾也是袭用了这两个都邑。周初所封的燕、蓟两个方国，都使用原有的城堡作为“都城”。周初燕国的都城遗迹犹存，考古发掘实测的数字表明，故燕都城墙东西长为850米，南北残存的部分仍有600多米，其城市规模为当时北方地区所仅见。到西周时，由于燕城的自然条件变化以及蓟国力量衰弱等原因，蓟国被燕国吞灭，其地为燕国所占，燕国将都城也迁到蓟城（即今广安门内外大街及其南北一带），而旧燕都逐渐被废弃。因此，在今天北京的行政版图内，最早出现的城市是蓟城。

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先秦到辽金，为了取得北部中国的控制权，多少的诸侯方伯、藩镇悍将曾在这里厮杀攻略。元代，是汉唐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其奠基时，有人向忽必烈建言：“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驿之所，非燕不可。”明成祖宏才大略，他迁都北京同样是基于能够让朱家王朝长治久安的思路，而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朱棣的决定后人如此解读：“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流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所谓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者也。且其气势之雄大，规模之弘远，视之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国祚悠久，非偶然也。”⁽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里，北京这样的形胜之地，乃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天

然首选。

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主要场所，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的兴起通常相互依存，中国早期的城市既是政治、经济、军事的统治中心，又是帝王、贵族保护私有财产的堡垒和统治人民的中心，同时也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商品交换中心。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地扩大，商业也随之逐步兴盛，并且大大地丰富了城市的功能。

中国最早出现的交换活动，见诸于文字资料的是在神农氏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³⁾尧治天下，“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所拙”。⁽⁴⁾虞舜为了自己的部落所需，“贩于顿丘”。⁽⁵⁾而在夏代，“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赋，懋迁有无，万国作义”。⁽⁶⁾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那些传说的时代里，相互间的物质交换，渐渐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容。商代，由于“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⁷⁾金属货币的产生，是衡量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将各种财富的价值表示出来。原始的物物交换，已演变成商品交换形式。自此，商业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而商人也明确地成为一种职业分工活跃于经济领域中。

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总是伴随着商业的进步与兴盛。商业的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商业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进步。我们看到，商业的发展使商代的城市，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布局及建筑上，都已远远地胜过夏代的水平。作为政治与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商业对于古代社会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那个时代的商业情况来看，中国的商业在产生之初就以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为中华文明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北京城市的兴起和北京商业的起源无疑也是循着这种发展模式。考古成果显示，在“山顶洞人”生活的时代，就有了交换行为的萌芽。周代，北京地区已经出现了城市。周初分封的“燕”和“蓟”就明显具有初期城市的形态和功能，与中国其他早期城市基本相同，琉璃河古燕都遗址厚达4米的城墙可以明显看出，在设计布局中，防御目的是古燕都筑城的一项首要功能。而居住区域的划分和排水设施的布置，表明在城市建设中已经出现了符合人类居住需要的市政工程。而从贝、蚌等原始货币的发现，我们可以审慎地

推测，故燕都出现了原始商业。

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其都城曾经相当繁荣，是北方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西汉时期，蓟城商业更趋繁荣，作为地区性的贸易重镇，这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的经济中心。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动荡战乱曾经使蓟城的城市经济受到重挫。直到隋炀帝时期，蓟城的城市地位开始提高，蓟城及涿郡的经济和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隋炀帝筹划征伐辽东时，蓟城是出师的大本营。为了尽快集中征辽物资，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在平地上开挖一条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以通运漕”，从根本上提高了运输效率。永济渠的开凿对于涿郡地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日后北京都市的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意思的是，隋朝因伐辽而耗尽国力，蓟城却因伐辽而在短期内走向繁荣。

唐代的北京商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时，幽州城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这里生产的布、绢、绫、绵、靴、帽等不仅供应当地市民的消费，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采购。发达的手工业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当时幽州城内的店铺，据统计已超过千家，经营着与民生相关的各种日常用品，商品内容相当丰富。除了当地生产的商品外，许多来自南方的物品，也在幽州市场上大量出现。作为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货物集散中心和边境重地，当时这里还是各族人民进行交往贸易的城市，商贸经济一度相当发达。

辽代，北京翻开了作为中国都城的历史新篇章。936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归辽国。幽州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归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政权统辖。鉴于幽州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繁荣的城市经济，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幽州“升为南京”。作为陪都，幽州的地位迅速上升。从北京城市发展史来看，自此进入一个辉煌而漫长的都市时代。诚如《燕都丛考·沿革》所言：“北京建都，实始于辽。”金朝继而立中都于此。

元朝建大都，北京开始拥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马可·波罗笔下的大都城气度恢宏，华美异常，壮丽富赡。元大都作为世界名城，几乎成为欧洲和西亚商旅的朝圣之地，俨然世界的商业中心，大量外国商人进出此城。

明朝，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北京古代历史上的商业发展也进入